

《格列佛游记》中的视觉隐喻与爱尔兰问题*

龚璇

内容提要 格列佛对失明的焦虑让我们关注斯威夫特对“肉眼”和“心眼”的区分。斯威夫特把生理眼光从理性认知的视觉修辞中剥离出来，否定视觉相对于其他感官的优越性，质疑“眼见为实”的真实性，藉此破坏殖民话语自我合法化的基础并揭露了英国游记（考察报告）对爱尔兰“生蛮”的他者化叙述。在斯威夫特看来，“客观”叙述下掩盖的冷漠与殖民者对殖民地人民苦难的“视而不见”都是“人性弱点”的体现，更是一种“道德败坏”。

关键词 《格列佛游记》 视觉隐喻 爱尔兰问题

DOI:10.16345/j.cnki.cn11-1562/i.2018.02.007

威廉斯认为 20 世纪斯威夫特批评的最大贡献是“不再把斯威夫特等同于格列佛、《木桶的故事》的作者、卑微的建议者或者其他斯威夫特虚构出来的作者”。^①然而，对于要不要把格列佛视为小说人物，并与其他讽刺散文中的虚构作者区别开来，却存在争议。早在 1928 年，穆尔便提出格列佛是“斯威夫特用艺术手法创作的小说人物”，^②但多数研究者仍然认为格列佛与《木桶的故事》中的雇佣文人一样，只是一个讽刺工具、“传声筒”。^③这种“仅在讽刺散文的文类语境下阐释《格列佛游记》的批评传统”让霍雷尔担忧，他认为该传统为传记式批评提供便利，导致了种种“把斯威夫特等同于格列佛”的误读。因此，他建议打破传统阐释框架，“重视《格列佛游记》作为小说的形式特征”。^④爱略特回应了霍

雷尔的建议，但对《格列佛游记》的小说属性存疑。通过对格列佛视角的形式分析，爱略特提出格列佛的人物性格缺乏“连续性”和“一贯性”，不是一个合理的小说人物。^⑤爱略特的观点为劳森承继，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劳森一直致力于证明格列佛是讽刺工具而非小说人物。^⑥

爱略特和劳森的研究富含洞见，但也有可商榷之处。通过梳理并澄清“讽刺”派在格列佛视角问题上的误判，本文重新分析了《格列佛游记》对叙述者—人物视角的运用，认为叙述者格列佛对人物格列佛视角的有效控制使《格列佛游记》的整体性远远超过“梅尼普斯式讽刺”《木桶的故事》，应该说，《格列佛游记》在形式上更接近 18 世纪游记小说。对格列佛视角的分析最终让我们注意到小

* 本文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编号：15YJC752008）和北京语言大学梧桐创新平台项目“中央高校基本业务费”（项目编号：18PT04）资助。

说的“爱尔兰”主题。作为一部游记模(戏)仿作品,《格列佛游记》与英国的域外“考察”叙事有着天然的对话关系:英国殖民者的考察、游记、日志以“眼见为实”为逻辑内核将殖民统治合法化,斯威夫特的“模仿性”写作则以破坏“考察”叙事的合法化根基为己任。在《格列佛游记》中,人物的生理眼光与眼光衍生的认知隐喻交相呼应,产生了层次丰富的讽刺效果,不仅戳破了“考察”叙事“眼见为实”的谎言,暴露了“大”英格兰塑造、传播、固化爱尔兰“他者”的话语机制,而且将“客观、真实”叙述掩盖下的“视而不见”作为一种道德败坏公之于众,揭露了宗主国对殖民地的漠然冷酷与暴虐无情。把《格列佛游记》中的视觉隐喻置于文本诞生的政治、宗教语境中加以考察可以看出,爱尔兰问题不是仅在第三卷或第四卷中“客串”出场的话题,^⑦小说对“眼见为实”与“视而不见”的讽刺贯穿始终,内含斯威夫特对英格兰中心主义的反驳和对爱尔兰问题的深度思考。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部小说与《布商的信》(1724-1725)、《爱尔兰状况简述》(1727)、《一个小小的建议》(1729)等政治小册子一样,是斯威夫特“爱尔兰写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我最怕伤了眼睛”: 被忽略的人物-叙述者视角

“讽刺”派否定格列佛的人物功能,主要因为他总是自相矛盾,缺乏“一致性”和“连贯性”,违反了写实主义小说的人物建构原则。所谓“不一致”指的是格列佛时而“不谙世事”(ingénu),时而“世故”甚至“愤世”(misanthrope)。爱略特提出,把《格列佛游记》看作小说就意味着区分“作者格列佛”(厌世者)与他“塑造的人物”(年轻

时的格列佛)。不谙世事是“人物”的性格,愤世是“作者”的性格,本应不谙世事的格列佛三番五次地变得愤世,就意味着人物性格失去“连续性”与“一贯性”。例如,格列佛评论利立浦特的国情时说,“这个帝国有几种非常特别的法律和风俗,如果这些法律和我的亲爱的祖国的法律不是完全相反的话,我真想替他们辩解几句。”^⑧爱略特说,这里的现在时意味着发表观点的是“作者格列佛”,然而愤世的作者坚持“理性至上”,决不会为了爱国心牺牲理性,只有天真的格列佛才会“在爱国心与理性发生冲突时遵从前者”。如果把这段话看成人物的观点表达,固然与其不谙世事的性格相符,却存在“时态上的不一致”。作者格列佛也可能是为了加强“逼真性”才用现在时,尽管这样会使他自己表现出“性格上的矛盾”。无论哪种“不一致”都体现了写作技巧上的不成熟,这样的矛盾多次出现,最终造成了斯威夫特在人物塑造上的失败。在爱略特看来,人物格列佛很像詹姆斯小说中的“意识中心”,但作者格列佛显然不能像詹姆斯那样圆熟地操纵视角。^⑨

爱略特对《格列佛游记》中“双重视角”的形式分析为斯威夫特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把作者格列佛与真实作者(詹姆斯)做类比,却偏离了他“在小说叙事框架下”阐释作品的初衷。^⑩如他所言,《格列佛游记》是厌世者格列佛对自己过去经历的讲述,格列佛既是叙述者又是人物。在小说叙事框架下,“作者格列佛”也是“人物格列佛”的一部分,都是真实作者斯威夫特塑造的小说人物。为了避免混乱,我们把作者格列佛改称为格列佛的“叙述自我”,人物格列佛改称为格列佛的“经验自我”。爱略特的偏误在于把格列佛的经验视角等同于第三人称人物有限视角,把格列佛的经验自我看成了叙述的“控制者”。^⑪事实上,叙述自我始终是叙述的控制者,爱略特说的“不一致”实则是格列佛叙述自我和经

验自我之间的视角转换。当格列佛说“……我的亲爱的祖国……”时，从其措辞可看出虽然说话者是叙述自我，但视角却是经验自我的。叙述者放弃愤世的眼光转而使用天真的眼光并非技巧上的“不成熟”，因为无论视角的转换还是时态的变化都是第一人称回顾性叙述者的特权，使得叙述自我的“成熟”（自讽）与经验自我的“无知”自然重合，同时增强了往事历历在目的效果，这种巧妙的视角转换恰恰体现了叙述者对视角的完全掌控，是斯威夫特继“拟声术”（personate）¹²后在叙述技巧上的一次新试验。

爱略特的文章发表于1952年，正是视角“这个涉及混乱最多的问题”在叙事批评界刚成为“热门话题”的时候，¹³难免有局限性甚至误判，但“讽刺”派的影响太大，以至于当代叙事学家在论及格列佛时也会前后矛盾。费伦阐释其小说人物理论时说，“在有的小说中，人物特点未能共同构成一个貌似真实的人物形象，譬如斯威夫特创造的格列佛……这样的人物具有模仿性特点，但没有模仿功能。”¹⁴他的理由是，“随着斯威夫特变换新的讽刺对象，格列佛的特征在每一个旅程中都发生了变化。”¹⁵申丹指出，费伦把格列佛“这样一个具有较强模仿功能的人物作为缺乏模仿功能的实例”，是因为他“未意识到模仿功能是以文学规约为基础、仅仅相对于‘叙述读者’而言的人物的内在功能”。¹⁶从费伦的行文可推测他在强调格列佛的“特征变化”时不自觉地换用了“讽刺散文”的阐释框架，然而“逼真性就是模仿功能，这是小说的一种内在功能，它产生于文学虚构的规约”，¹⁷格列佛有“模仿性”正因为他是“作者采用现实主义手法创造的人物”。¹⁸

现实主义是17、18世纪游记文学的主要手法。据谢尔博考证，《格列佛游记》模仿影射的不是个别游记而是“整个游记文学”。¹⁹其时，游记文学“正逐渐成为报道新世界的权

威文本”，²⁰其权威源自报道的真实可信，所以斯威夫特依据游记常规，让第一人称叙述者在开篇自陈身世背景，又让出书者保证其言无虚，还在书中附上了航海图并详细标明出航时间、地点、风向、经纬度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格列佛是用现实主义手法创造的、具有较强模仿功能的人物，不仅是事件的讲述者还是事件的经历者。事件经历者格列佛出场不久就对自己的双眼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关注：作为俘虏他接受了利立浦特官吏的搜检，只有“一个秘密口袋逃过了检查”（19页）。帮助利立浦特阻止不来夫斯古帝国的侵略时，格列佛动用了他的秘密武器：袖珍望远镜帮他掌握了军情，眼镜帮他挡住了敌人的箭雨。虽然小人国的军队对他不构成性命威胁，但他“最怕伤了眼睛”（34页），有了眼镜的防御，他顺利完成任务成为利立浦特的大功臣，从俘虏变成尊贵的“那达克”。然而这次行动也暴露了他的命门，利立浦特宫廷给他定罪后商议的秘刑便是“刺瞎双眼”（53页），为了保全眼睛他逃到了不来夫斯古帝国。这个时时把“眼睛”挂在嘴上的格列佛仿佛在提醒我们，为游记的“真实可信”提供根本保证是旅行者的“亲眼目睹”。根据18世纪的美学标准，文学语言的理想境界是文辞生动，能够在读者心中刻印下栩栩如生的画面，一个优秀的游记作者不仅要亲眼看世界，还要用文字打动读者，让读者通过文字“看到”他的所见所闻。因此格列佛多次向读者强调其叙述的回顾性与视觉性“这次旅行的全部情节在我心里造成了强烈的印象，使我牢牢地记在脑中。因此我写出书来并没有漏掉一件重要事情。”（73页）

我们认为，在叙述经历的同时充分实现作为经历者的人物功能是格列佛与仅充当作者“喉舌”的雇佣文人之大不同所在。首先，作为自身经历的叙述者，格列佛既是聚焦对象又是聚焦者，这意味着，他的回顾性眼光才是整个叙事的常规视角。劳森在比较类文本声音和

正文声音(1735年版)时说,“[格列佛给辛普生的]信中的声音是幻想破灭、厌恶人类的格列佛的声音,这个声音我们直到第四卷才能听到……格列佛在叙述他的几次航海之旅时表现出来的风格不是一种追溯性(ex post facto)、统筹性的人格,而是他在相应旅程期间的样子,这是他的基本叙述视角(rudimentary narratorial perspective),类似语法上的‘历史现在时’。”^②劳森先是误认为只有信中的声音才是回顾性叙述者的声音,接着又从叙述声音“滑入”叙述视角的讨论,与爱略特一样把经验自我的视角看作正文中的常规视角,造成了双重混乱。从格列佛对其回顾性叙述之视觉效果的强调足见他对自身叙述之“追溯性与统筹性”有着极为清醒的认知。这种追溯性与统筹性的眼光贯穿全书各卷,给辛普生的信写于全书出版“六个月”后,这个时间差并没有构成叙述声音的本质区别。我们可以把信中的叙述者大致等同于正文中的叙述者,所谓前三卷与第四卷之间出现的“声音”(叙述者立场与观念)变化是因为叙述者在前三卷的叙述中有意放弃现在的眼光(幻想破灭的、厌恶人类的),换用经历自我的眼光(在小人国、大人国、飞岛的眼光)。为了达到更好的修辞效果,斯威夫特在特定情况下还会放弃格列佛的眼光转用其他人物(小人、巨人、慧骃甚或一种集体的)的眼光。

辨别视角转换的关键在于区分生理范畴的眼光与认知及意识形态范畴的眼光。遗憾的是,这一区分一直埋没于评论者对视角问题的比喻性修辞中。比如,在布罗卜丁奈格旅行时格列佛成了一名显微镜技术员;^③又如,与其说格列佛是一名显微镜技术员,不如说他就是一部显微镜,^④“显微镜式与望远镜式的眼光为斯威夫特提供了看与被看的极端条件,事实上这也是前两卷的认知框架”。^⑤我们早被告知,格列佛是个普通人,“视力很差,有时要戴眼镜”(19页)。无论他的眼睛还是眼镜都没有显微镜或望

远镜的功能;无论在小人国还是大人国,他所见之人、物都不是经他的眼“缩小”或“放大”过的,他不厌其烦地提供所见人、物的尺寸,就是以“常人”之眼描画、计算非常之大小。这种修辞性的评论语言把生理范畴的眼光与认知框架一概而论,完全忽略斯威夫特在话语层面上对感官与认知之间复杂关系所做的语言处理,而这恰恰是解读格列佛眼光之艺术价值与意识形态意涵的钥匙之一。

二、“被洗脑的”格列佛: “眼见为实”之谬

18世纪经验主义哲学为“眼见为实”的文艺美学提供了理论依据,经验主义强调感官体验是一切知识的来源,所有感官中视觉又是最重要的。洛克在《人类理解论》(1690)中开宗明义地指出,“理解如同眼睛一样,在判断物象时,只以自己所见的为限。”^⑥他认为视觉的中心地位是由其功能决定的,视觉“是一切感官中范围最广的一种,不但能把自己特有的光色观念传入人心中而且能把与之极相差异的空间、形相和运动等观念传入人心中”。^⑦对此贝克莱并不赞同,他以洛克与毛凌诺的问答为引,论证了触觉之于视觉的优越性,推翻了视觉至上的观点。毛凌诺曾问洛克:一个生而盲者,成年后通过触觉学会了区别辨认同样质地、同样大小的立方体和球体。如果他突然获得了视力,这时候把同一个立方体和球体放在桌上,那么他在触摸这两个物体之前,能否仅凭视力区别辨认出哪一个是球体,哪一个是立方体?洛克认为不能,因为这位生盲还没有获得足够的经验让他在手触的形状和眼见的形状之间建立起必然关系。贝克莱补充道,“一个生而盲的人,后来如果能有了视觉,他亦不可能在起初就凭视觉得到距离的观念。”^⑧他逐一讨论了视觉和触觉的对象,提出视觉的对象只

有光和色，而距离、大小、位置都是触觉的对象。

生盲的例子被斯威夫特用于《格列佛游记》中：格列佛参观格拉多科学院时遇到“一个生来就瞎了眼睛的人，他的几位徒弟也跟他一样，他们的工作是为画家们调色。先生教导学生用触觉和嗅觉来辨别颜色。不幸的是我发现他们的功课进行得并不好，就是教授自己也往往弄错”（154页）。其实，贝克莱新论的影响在《格列佛游记》的开篇就有体现。躺在利立浦特草地上的格列佛一觉醒来时发现天已经亮了，而自己被缚在地上，眼睛除了天空以外，什么也看不见，“我觉得从腋窝到大腿上，身上横绑着几根细绳……只觉得有个活东西在我左腿上蠕动，它越过我的胸脯，慢慢地走上前来，几乎来到我的下颌前了。我尽可能用眼睛朝下望，却原来是一个身长不到六英寸、手里拿着弓箭、背着一个箭袋的活人。”（5页）为了制造并保持悬念，叙述者在这里切换成经验自我的视角把利立浦特人称作一个“活东西”、“它”，又极其细致地复述了“它”的行动、身高和装束，最后才慢条斯理地告诉读者这是一个“活人”。这番描述把格列佛从触觉感知到视觉感知的认知过程用慢镜头进行回放，不但肯定了视觉对光和色的认知（天亮了）而且突出了触觉先于视觉对认知的贡献（“活”的判断来自触觉）。

贝克莱告诉我们，偏见源自“经验”，误把触觉认知当作视觉认知是因为人们凭经验把某种视觉观念和触觉观念联系在一起，“在凭借屡次的经验认识了各种视觉观念和触觉观念之间的联系，才能单凭视觉的现象，在似乎直接的方式下来估量与此相应的可触事物的位置和形式。”^②经验的作用反映在格列佛对飞岛的两次描述中。飞岛初次飞到格列佛头上之前，“天空晴朗，太阳炽热”，格列佛正在岩石间走动，“忽然我的眼前暗了起来，但是当时觉得这和头顶上飞来的一片云的情形大不相同。

我转身来却发现头上有一个不透明的大东西遮住了太阳，它正朝着岛飞来……那东西渐渐走进我站的地方，看来竟是一个固体。它的底面平滑，映着下面的海水闪闪发光。”（130页）当时的格列佛完全没有“飞岛”的概念，他初步判断这是个不同于云的“大东西”，经过观察后进一步确认了它的性状：不透明、固体、底面平滑。大小、软硬、平滑本是触觉认知，格列佛能够在一见之下以云为参照对“飞岛”的物理属性做出描述是凭借他的生活和航海经验。两章之后，在“飞岛”上生活了一段时间的格列佛对它进行了重新描述：“飞岛，或者管它叫浮岛……从下面看来，岛底或者说它的下表面是一片大约有二百码厚的平滑、匀称的金刚石。”（140页）与第一次模糊简要的描述不同，这篇长达两页的论述使用了精确的数据、专名，援引了科学家的理论，还配上了平面图，堪称一篇“严谨的”学术报道。格列佛在认知上的变化源于他在勒皮他岛上积累的新经验，据他所言，勒皮他人以学术见长，尤擅数学和音乐。

有趣的是，格列佛把岛和云视为性状迥异的异类，慧骃国的栗色马却认为两者可以类比。格列佛说，“我仿佛看到东北方面有一座小岛……但是在栗色马的眼中那却只是一片蓝色的云彩，因为除了本国以外它并不知道还有别的国家存在，所以它辨别不出在辽阔的大海的远处有什么东西，当然不能像我们这些整天和海水打交道的人辨别得那么清楚了。”（243页）在无法触摸远处物体的情况下，任何“目测”的结论都只是经验使然，而这种将某种触觉与某种视觉联系在一起的经验虽然是恒常的、习惯性的，却不是必然的。贝克莱发现，“在所见观念和由它们所暗示的所触观念之间，并没有任何必然的联合。”^③这种关联不仅是任意的而且和语言一样有象征性，“所见形相之表象所触形相，正如所写文字之表象声音一样……任何语言中的文字所以毕竟能标记

一声音,诚然是任意的……”^③

经验的偶然性、任意性与象征性意味着所谓的眼见之“实”可能只是成见、暗示乃至道听途说,它们窃取了“真实”的道德权威以各种形式进行自我复制与再生产,成为形塑个体认知与判断的“客观事实”。初见巨人的格列佛十分害怕,因为“据说(are observed to),人类的身材越高大,性情就越野蛮、残暴。如果我被一个野蛮的巨人捉住,他就会一口吃了我,除此外难道还有什么希望吗?”(66页)从上下文看,以“客观”报道的形式出现的“常识”(巨人都是野蛮人)是叙述者以自由直接引语形式转述经验自我的想法,它保留了经验自我的语气,解释了经验自我的“知识”来源。与直接引语相比,它能使经验自我的想法更自然地融入回顾性叙述语流中,而它传播的“常识”也就借机完成了又一次自我复制。斯威夫特不让叙述者以自己在巨人国的经历反驳这一“常识”,反而让他隐而不叙,是为了让读者体验格列佛当时的忧惧,更是为了暴露偏见的根源——早期航海者和殖民者传布的域外生蛮的故事。区分格列佛的认知判断与他人的认知判断(尤其是以“据说”形式出现的“常识”)对于我们评价格列佛的“善变”与“不一致”非常重要。格列佛最突兀的变化是由一个“典型的英国人”变成一只“奇妙的耶胡”(234页),早期论者认为这是斯威夫特仇恨人类的病态想象,当代评论家关注耶胡对爱尔兰人的影射并试图剖析斯威夫特矛盾的民族认同。^④我们认为,斯威夫特对爱尔兰的复杂情感并不妨碍他清醒地认识到爱尔兰被他者化的事实,他在《格列佛游记》中技巧性地展示了耶胡/爱尔兰本土人的邪恶形象是如何通过“有目共睹”的“客观”叙述流传开来的。格列佛说,“[我的主人]极想知道我是……怎样学到了模仿理性动物的本领,因为‘耶胡’……据说(were observed to)是一切畜类中最难驯养的动物。”(203

60

页)此处,格列佛从贤马主人口中听闻了耶胡的顽固,同时以间接引语转述了主人的经验之谈,在后文中他以“亲眼所见”给耶胡加了一条罪状,同时补充了另一番经验之谈:“根据我所看到的事实来说,‘耶胡’似乎是最不可教导的动物……据说(It is observed)红毛的公母‘耶胡’比其他‘耶胡’来得更为淫荡而险毒。”(229页)顽固与难以驯化是斯宾塞在《爱尔兰现状一览》(1633)中对爱尔兰本土人的刻画,而爱尔兰人淫荡、嗜血的传言则可以追溯到古罗马地理学家斯特拉波的《地理学》。^⑤格列佛的眼光多么诚实地还原了传言与成见在反复使用的过程中成为“眼见之实”的过程!准确地说,他不是一个说谎者而是一个“轻信者”,一个“被洗脑”的“典型英国人”。

多诺霍用“洗脑”解释格列佛的“反复无常”:轻易地“抛弃既有观念,尤其是政治观念,接受另一套观念”。^⑥刚出场时,格列佛是个“典型的英国人”,他的教育背景、航海经历、计算和语言能力与“当时大多数英国人”无异,他的政治立场、价值取向也都是英国式的。这个英国人在慧骃国接受了一套新观念,回英国后又慢慢变回一个英国人,因此《格列佛游记》堪称格列佛被反复“洗脑”的经历。多诺霍说,斯威夫特以格列佛讽刺理性至上论,认为“人不过是环境的产物,任何一种结构性的力量都能控制他,从一处逃到另一处,不过是新一轮洗脑的开始”。^⑦“结构性的力量”可以是暴力的也可以是非暴力的,包括任何以文字或非文字形式固定下来并反复使用的经验、习俗、观察、报告。斯威夫特的成功之处就在于把格列佛的肉眼(感官)与心眼(认知)区别开来,让格列佛在模仿他人话语时暴露出各类“集体目光”,即控制他并导致他“不断变化”的结构力量。联系欧洲航海家的海外游记中堕落懒惰的本土人,斯宾塞的考察报告中野蛮、难被驯化的爱尔兰人,与

其说斯威夫特是厌人症患者，不如说他不必借助后殖民主义的视角就洞见了早期欧洲殖民经验的话语模式，以及这种模式是如何被“轻信者”接受且继续传播直至成为“真理”的。

三、“视而不见”：一种道德败坏

指出在空间认知中触觉比视觉更不可或缺的是贝克莱对视觉中心主义的最后一击。他提出，“假定有一种灵物，一种无身体的精灵，能清晰地知觉视觉的专有的直接对象，而无触觉”，那么这种灵物将“没有任何距离观念”、“立体的观念或三项数量的观念”。^⑤贝克莱的新论在当时可算离经叛道，因为培根要求经验哲学家保持与观察对象的距离以获得“认知的自由和清洁”（the mind totally liberated and cleansed）。^⑥这一隐喻性修辞把触觉贬为污染视觉的不洁之物——使观察者不能保持对观察对象的“冷淡”和“漠然”（indifferently），妨碍观察者获得“真知灼见”，终将破坏经验认知的合法性。爱尔兰的生活经历让斯威夫特认识到，“大”英格兰人就是以这种“冷淡”、“漠然”的态度对待爱尔兰人的。早期的考察者以“眼见为实”之名把爱尔兰耶胡作为实验对象进行“观察”，现在的统治者则像飞岛权贵那样封闭了感官对爱尔兰人的困苦“视而不见”。

勒皮他人堪称贝克莱“灵物”的翻版。格列佛说飞岛上的达官贵人长相奇特，“一只眼睛向里凹，另一只眼睛却瞪着天顶”，没有拍手提醒就“不能说话也听不到别人说话”，他们“总是在埋头苦思，不时会有堕落悬崖或者头碰在柱子上的危险”（134页）。他们没有距离观念也没有立体的观念，做出来的衣服“不成样子”（136页），房屋也“建筑得很坏”（137页）。触觉迟钝的结果是缺乏同情心。斯威夫特似乎比“情感主义”者更早认识到，同情作为人之常情是通过“敏感的”

身体接触习得的。据格列佛观察，飞岛上达官贵人的生存全然依赖拍手与“下界”^⑦的百姓，但“对老百姓的呼喊，他们看了、听了却都无动于衷”（134页），老百姓若有抵抗，他们就用飞岛“剥夺‘下界’享受阳光和雨水的权利”，让人们“遭受饥饿和瘟疫的灾难”，或者向人们投掷巨石，“把他们的房屋打成粉碎”（144页）。面对这样的统治者，林达里诺的居民“团结一致”进行反抗，“使国王的策略完全破产”（145页），被迫同意了民众的要求。

研究者大多同意林达里诺反抗是对伍德铜币事件的影射。将《布商的信》与创作于同一时间的《格列佛游记》第三卷作参照阅读，我们发现铜币案的影响远不止体现在反抗事件中。在第一封信中，布商垂皮尔这样解释伍德铜币的真实价值——“在英国，半便士和四分之一便士都是足值币，把它们砸碎了卖给铜匠，损失不会超过一便士。但是伍德先生用劣质铜制造的半便士比英国的小很多，铜匠不会用一便士的真钱换伍德的一先令。所以，我们用十万零八百磅的真金白银买来的是垃圾，其真正的价值不会超过八九千磅。这还不是最糟糕的，只要他愿意，伍德先生可以偷偷再运来十万零八百磅，以十二分之一的低价购买我们的货物。比如，一个帽商卖一打帽子，每个帽子五先令，一打就是三英磅，如果用伍德的钱付款，帽商真正收到的就只有五先令了。”^⑧因此，垂皮尔说，“我有一家爱尔兰丝物的铺子，东西着实不赖，但我决定不用伍德先生的假币，我打算和隔壁的肉铺、面包店、啤酒店以及其他店铺的老板们以货易货。这样就可以保住我的真金白银，我的心血，留到好年景再用，或者留到我真要饿死的时候用。”^⑨

垂皮尔的决定让我们想到格拉多科学院三位教授的“以物示意”计划。一直以来，评论界都把此节看作对皇家学会的讽刺，可联系两处文本，“以物示意”的讽刺对象又何尝不

是伍德及英国权贵! 在主权信用货币的概念还没有出现的18世纪上半叶, 斯威夫特就认识到货币与词汇相似的“符号”功能, 是不是从贝克莱的视(触)觉语言模型中获得了启发呢? 从斯威夫特的藏书目录和私人书信可知, 他不仅收藏了《视觉新论》而且对它的作者评价很高。在写给新任爱尔兰总督的信中, 斯威夫特盛赞贝克莱是“这个王国最具美德最有学问的贤者之一”。^①对于斯威夫特把“美德”(Virtue)放在“学问”(Learning)之前, 弗于斯克颇为不解, 因为贝克莱最著名的尝试是去海外殖民地办大学, 但他“在爱尔兰政治生活中似乎并无建树”。^②表面看来是这样, 然而联系斯威夫特对孟诺第老爷的刻画便不难理解他为什么把美德放在学问之前了: 来爱尔兰的“创业者”(projector)多是伍德之流, 而爱尔兰需要像孟诺第老爷和贝克莱这样有实干精神又能坚持信仰的有德之人。

在斯威夫特看来, 美德甚至应该放在政治之前, 这应该与他的信仰和后半生的职业有关。1714年, 政治失意的斯威夫特回到爱尔兰成为都柏林圣·帕特里克大教堂的主教。他在远离伦敦的“放逐之地”保持着沉默, 直到1720年才以一篇号召爱尔兰人抵制英货、使用本地产品的檄文重回政治舞台。此后, 他对英国的政党斗争以及“英国的内部政治”关注得越来越少, 却对“英-爱关系”关注得越来越多,^③“从一个英国国教徒变成了一个与滥权者彻底对立的讨伐者”。^④“讨伐者”斯威夫特的精神支柱依然是他的宗教信仰: 他讨伐伪造货币者, 因为“在上帝的眼中, 所有施于民众的故意伤害都是十分严重且罪加一等的罪”;^⑤他讨伐“视而不见”者, 因为在上帝眼中, “对他人苦难的无动于衷与迟钝无情堪称人类堕落与虚弱的附带品”。^⑥发出如此道德拷问的斯威夫特显然不再是政党的“喉舌”而是令滥权者忌憚、让数万教众敬畏的都柏林主教。谢里丹把斯威夫特称作都柏林

的“总监察长, 就像罗马监察官那样令人敬畏”,^⑦爱尔兰总督也认为“管理爱尔兰”的秘诀在于“取悦斯威夫特博士”,^⑧因为“这座城市在斯威夫特的保护之下, 这里的人严格遵守圣·帕特里克的训诫”。^⑨哈蒙德称远离政治中心的斯威夫特在圣·帕特里克的讲坛上释放了他的沮丧与失望, 或者说, 身为都柏林主教的自觉正是斯威夫特放弃对宗主国的政治幻想, 从情感上发生“彻底改变”的根本原因。

注释:

- ① Kathleen Williams ed., *Jonathan Swift: The Critical Heritage*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70), p. 27.
- ② John Brooks Moore, “The Role of Gulliver”, *Modern Philology* (May 1928), p. 469.
- ③ 弗莱认为作为“梅尼普斯式讽刺”, 《格列佛游记》“在人物刻画上有别于小说, 即不是写实, 而是将人物程式化, 使他们变成各自思想的传声筒”, 但他同时也承认, “二者之间不可能也不应该划出一条截然的界线”。详见诺斯罗普·弗莱《批评的解剖》, 陈慧、袁宪军、吴伟仁译, 吴持哲校译, 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 460页。
- ④ Joe Horrell, “What Gulliver Knew”, *The Sewanee Review* (Oct. - Dec. 1943), pp. 476-477.
- ⑤ Robert C. Elliott, “Gulliver as Literary Artist”, *ELH* (March 1952), pp. 49-63.
- ⑥ Claude Rawson, *Gulliver and the Gentle Reader* (New Jersey: 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 1973), 27页。20世纪70年代以来, 研究者大多回避了“讽刺散文或小说”的争论, 采取折衷态度称《格列佛游记》为“讽刺小说”, “讽刺”也主要被视为一种广义上的修辞手法, 像劳森这样坚持把《格列佛游记》作为讽刺散文的批评家被称为“强硬派”。
- ⑦ 在“讽刺散文”的阐释框架下, 《格列佛游记》的第一、二卷一般被看作是对英国朝政的讽刺, 第三卷是对皇家学会及启蒙理性的讽刺, 第四卷是对整个人类与人性的讽刺。爱尔兰文学研究者认为第三、四卷也揭露了英国作为“殖民者”对爱尔兰的奴役, 但并不把它看作贯穿全书的主题。参见Declan Kiberd, *Irish Classics* (Cambridge: Harvard UP, 2001), 93-98页; Terry Eagleton, *Heathcliff and the Great Hunger* (London: Verso, 1995), 156-159页; Ann Cline Kelly, “Swift’s Explora-

- tions of Slavery in Houyhnhmland and Ireland”, *PMLA* (October 1976), 846 – 855 页。
- ⑧ 斯威夫特 《格列佛游记》，张健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5 年版，41 页。以后引用，在正文中随文标注页码。译文中时态的变化不明显，原文为 “... I should be tempted to say...”
- ⑨ Robert C. Elliott, “Gulliver as Literary Artist”, pp. 49 – 63.
- ⑩ Robert C. Elliott, “Gulliver as Literary Artist”, p. 49.
- ⑪ Robert C. Elliott, “Gulliver as Literary Artist”, p. 50.
- ⑫ Jonathan Swift, *A Tale of A Tub*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20), p. 7.
- ⑬ 申丹 《叙事、文体与潜文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78 – 79 页。
- ⑭ 译文引自申丹、韩加明、王丽亚 《英美小说叙事理论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245 页。
- ⑮ 译文引自申丹、韩加明、王丽亚 《英美小说叙事理论研究》，245 页。
- ⑯ 申丹、韩加明、王丽亚 《英美小说叙事理论研究》，246 页。
- ⑰ 申丹、韩加明、王丽亚 《英美小说叙事理论研究》，245 页。
- ⑱ 申丹 《多维 进程 互动——评詹姆斯费伦的后经典修辞性叙事理论》，载《国外文学》2002 年第 2 期，5 页。
- ⑲ Arthur Sherbo, “Swift and Travel Literature”, *Modern Language Studies* (Autumn 1979), p. 115.
- ⑳ Jenny Mezciems, “Utopia and ‘The Thing which is not’: More, Swift, and Other Lying Idealists”, *University of Toronto Quarterly* (Fall 1982), p. 46.
- ㉑ Claude Rawson, “Gulliver, Travel and Empire”, *CLCWeb: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December 2012), p. 4.
- ㉒ Marjorie Nicolson, “The Microscope and English Imagination”, *Smith College Studies in Modern Languages* (July 1935), pp. 1 – 92.
- ㉓ Deborah Needleman Armintor, “The Sexual Politics of Microscopy in Brobdingnag”, *Studies in English Literature, 1500 – 1900* (Summer 2007), pp. 619 – 640.
- ㉔ J. Paul Hunter, “Gulliver’s Travels and the Later Writings”, i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Jonathan Swift*, ed. Christopher Fox (Cambridge: Cambridge UP, 2003), p. 230.
- ㉕ 洛克 《人类理解论》，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 1983 年版，9 页。
- ㉖ 贝克莱 《视觉新论》，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 1957 年版，56 页。
- ㉗ 贝克莱 《视觉新论》，16 页。
- ㉘ 贝克莱 《视觉新论》，ix-x 页。
- ㉙ 贝克莱 《视觉新论》，18 页。
- ㉚ 贝克莱 《视觉新论》，62 页。
- ㉛ Declan Kiberd, *Irish Classics* (Cambridge: Harvard UP, 2001), p. 98; Terry Eagleton, *The English Novel*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5), p. 50; Claude Rawson, “Gulliver, Travel and Empire”, p. 6.
- ㉜ 转引自 Claude Rawson, *Swift’s Angers* (Cambridge: Cambridge UP, 2014), 24 页。
- ㉝ Denis Donoghue, “Swift and the Association of Ideas”, *The Yearbook of English Studies* (Special Number 1988), p. 12.
- ㉞ Denis Donoghue, “Swift and the Association of Ideas”, p. 12.
- ㉟ 贝克莱 《视觉新论》，68 页。
- ㊱ Francis Bacon, *The New Organon*, eds. Lisa Jardine and Michael Silverthorne (Cambridge: Cambridge UP, 2000), p. 56.
- ㊲ 黄梅 《推敲“自我”》，三联书店 2015 年版，102 页。
- ㊳ Jonathan Swift, *The Works of the Rev. Jonathan Swift, D. D. Vol. IX* (London: R, Baldwin and Son, 1801), p. 17.
- ㊴ Jonathan Swift, *The Works of the Rev. Jonathan Swift, D. D. Vol. IX*, pp. 20 – 21.
- ㊵ Christopher J. Fauske, “A Most Unlikely Friendship?”, *Swift Studies* 25 (2010), p. 152.
- ㊶ Christopher J. Fauske, “A Most Unlikely Friendship?”, p. 152.
- ㊷ Eugene Hammond, *Jonathan Swift: Our Dean* (Newark: University of Delaware Press, 2016), p. 164.
- ㊸ Eugene Hammond, *Jonathan Swift: Our Dean*, p. 78.
- ㊹ Jonathan Swift, *The Works of the Rev. Jonathan Swift, D. D. Vol. VIII* (London: R, Baldwin and Son, 1801), p. 165.
- ㊺ Jonathan Swift, *The Works of the Rev. Jonathan Swift, D. D. Vol. IX* (London: R, Baldwin and Son, 1801), p. 244.
- ㊻ Eugene Hammond, *Jonathan Swift: Our Dean*, p. 193.
- ㊼ Eugene Hammond, *Jonathan Swift: Our Dean*, p. 308.
- ㊽ Eugene Hammond, *Jonathan Swift: Our Dean*, p. 633.

(作者单位: 北京语言大学英语学院)
责任编辑: 魏丽明

careful interpretation of the social context , it aims to provide a complementary understanding of these issues.

British Metamodernist Poetry and the Chinoiserie in *Loop of Jade*

SANG Culin

Metamodernism is a term used by the 21st-century European new art theorists to describe a contemporary “structure of feeling”. In the past few years , this term has been picked up by British poets and artists to describe their own aesthetic Zeitgeist. Under the impact of contemporary American experimentalist literature , British metamodernist poetry seeks an “oscillation” between the modernist “sincerity” and responsibility , and between the postmodernist irony and nihilism. British poet Sarah Howe’s *Loop of Jade* , which won the 2015 T. S. Eliot prize , reflects this kind of “oscillation”. Given her half Chinese ancestry , and her conscious use of Chinese themes , the metamodernity in *Loop of Jade* is closely correlated with a distinct Chineseness.

The 19th-Century American Literary Cartography’s Impact on the Construction of American Sea Space

HOU Jie

By using literary cartography ,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antebellum American oceanic novels and tries to reveal how the American literary cartography in the antebellum American oceanic novels reflects and participat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American sea space. The writers , by composing the “individual narrative” , “national narrative” and “post-national narrative” , tear the British colonial map , construct the American national chart , redraw the American national chart boundary , and predict the arrival of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by portraying a world chart.

Republicanism , Public Sphere and Bare Life: Politics in *Julius Caesar*

HU Peng

Julius Caesar is one of the greatest tragedies of Shakespeare. Most of Shakespearean scholars believe that it reflects the conflict between republicanism and monarchy. This paper tries to explore Shakespeare’s view on politics through Jürgen Habermas’s concept of public sphere and Giorgio Agamben’s concept of bare life.

Visual Metaphors and the Irish Problem in *Gulliver’s Travels*

GONG Xuan

Gulliver’s anxieties about his eyes draw our attention to Jonathan Swift’s clear division between

“corporeal eyes”, which are not more powerful than other sense organs and “intellectual eyes”, which metaphorically suggest eyes’ privileged connection with mind. This division, with its challenge to Enlightenment ocularcentrism, enables Swift to problematize the colonial rhetoric of “eyewitnessing” and to expose the “Othering” of Ireland in English travel narratives. For Swift, Dean of St. Patrick, the indifference behind the “objective” and objectifying eye of the traveler, just like the blind eye that English governors turn to the Irish, is nothing but a result of “the frailty and corruption of humankind”.

Chinese Gardening, Religion and Politics: Imagining China in *Kubla Khan*

HU Yuming

Until very recently, with the critical neglect of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gardening upon British romanticism, “the most obvious, literal fact that *Kubla Khan* is a poem about the garden of a Chinese Emperor” has also been missed. This essay provides both a sketch of Chinese gardening’s influence on Coleridge’s *Kubla Khan* as well as a panoramic view of China’s appearance in the British romantic period.

The City of Desire and the Efficiency of Choice Making: An Analysis of the Implied Meaning of the City in *Sister Carrie*

JIN Hengshan

From life in an unknown small town to life in a glamorous city, Carrie’s success could not happen without her living in the big city. Dazzled by the city life, Sister Carrie, at the same time, inevitably developed a sort of driving force called desire deeper in her heart. The city provides a space for her to grow and explore, where she discovered the secret of the city’s logic: the efficiency of choice making and the related defeat and cruelty.

On George Eliot’s Hostile Portrayal of Rosamond

WANG Shufang

Rosamond is an ideal lady of beauty, accomplishments and elegance in George Eliot’s representative work *Middlemarch*, while she also elicits fear and loathing from the reader. Eliot has been accused of casting hostility on this lady. Through an analysis of the text and the historical context, the author concludes that Rosamond is the result of Eliot’s concept of “experiments-in-life”.

Fluid Motherhood in Toni Morrison’s *A Mercy*

MAO Yanhua

Toni Morrison creates a group of mothers in her *A Mercy*: unnamed black mother, white mother Ealing, unmarried mother Sorrow and othermother Lina, etc. Various mother images just present fluid moth-